“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钱林森主编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法] 皮埃尔·绿蒂
Pierre Loti 著

马利红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法）皮埃尔·绿蒂
Pierre Loti 著
马利红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法）绿蒂（Loti，P.）著；马利红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钱林森主编）
ISBN 7-80678-597-3
Ⅰ.在… Ⅱ.①绿…②马… Ⅲ.日记—作品集—法国—近代 Ⅳ.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0016 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姜宁馨
封面设计／许尤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出版专有权归上海书店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本书中译本译自 Pierre Loti，*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Kailash Editions，Paris，1985。）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皮埃尔·绿蒂 著
马利红 译

责任编辑 欧阳亮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168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80678-597-3／I·71
定 价 24.00 元

总　序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①]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

①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第197页，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 contes chinois*，1723)、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①]、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亚历山塔丽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à Lhassa*，1927)，以及《开放的中华》[②](*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① 中译本名为《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② 该书中译本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 par OLDE Ni CK?)，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 de l'Escalier)妲妮爱尔·娜海(Dan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çois Mo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

中译本序

对中国读者来说，皮埃尔·绿蒂(Pierre Loti，1850——1923)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法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一个重要作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便由徐霞村介绍到中国，"绿蒂"这个颇具女性化的译名正是由该译本在中国读书界传开来的。30年代文坛名家叶灵凤还特地撰文道说由来[①]，并在一篇书话中评论过绿蒂写中国题材的短篇[②]。差不多同时，绿蒂另一部名著《冰岛渔夫》(*Pêcheur d'Islande*)也由我国知名翻译家黎烈文译出，介绍到了中国，《冰岛渔夫》在80年代又有弋沙重译本，在我国颇为流传。

---

① 1872年，年轻水手朱利安·韦奥访问太平洋中的塔希提岛，"岛上女王的宫女一再称呼他为'Loti'，他觉得奇怪，询问之下，这才知道是岛上的土话，是岛上女人对于心爱的漂亮男人的昵称。……绿蒂听了很高兴，后来写文章，就采用这句塔希提岛的土语为笔名。"见叶灵凤《关于"女"作家绿蒂》，《叶灵凤书话》第244－245页，北京出版社，1994年。"绿蒂"是徐霞村译《菊子夫人》的中文译名，本书译文沿用此名。

② 叶灵凤，《绿蒂笔下的中国猫》，见《叶灵凤书话》第242－243页。

绿蒂，原名朱利安·韦奥(Julien Viaud)，出生在法国西部海滨城市罗舍福尔(Rochefort)的一个基督教徒的大家庭里，从小就酷爱大海，梦想当个水手，周游列国。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飘洋过海，长达40年之久。他走遍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到过土耳其、塞内加尔、大洋洲、巴基斯坦、波斯、埃及、印度、中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丰富的海上阅历和异域的奇风异俗，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1879年他以《阿姬亚黛》(*Aziyadé*)这部充满异国情调的处女作一鸣惊人，从此步入文坛。绿蒂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绿蒂的婚姻》(1880)、《一个非洲骑兵的故事》(1881)《我的兄弟伊弗》(1883)《冰岛渔夫》(1889)、《菊子夫人》(1887)、《拉默河》(1897)等小说和《耶路撒冷》(1895)、《走向伊斯法罕》(1904)、《吴哥的进香者》(1911)、《在北京最后的日子》(1902)等散文和游记，1904年他和女作家朱笛特·戈蒂耶合作写出中国题材的剧作《天之女》。这些作品被评论界誉为给"法国小说添了一种新的空气，在法国散文里输入了一种新的音乐"①。1892年他以多数票击败了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绿蒂作为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代的法国作家，既是这一时期方兴未艾的西方殖民文学、异国主义文学主要写手，又是世纪之交中西关系由对抗走向对话的转折期的亲历者、见证人，因而引起中国读者、学者的关注。呈现于读者之前的这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正是体现着绿蒂这

① Frank Harris语，转引自徐霞村《菊子夫人》中译本序(1929年，商务印书馆)。

双重身份的典型文本。绿蒂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曾以法国海军上校身份，两次应召出征入侵北京，一次是1900年9月底至11月初，另一次是1901年4至5月间。两次远征北京，使之一睹西方列强血洗“衰老帝国”和“帝都”的现场，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私人日记》(*Journal Intime*)和据此写就发表的游记《北京的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①——这便是这位海军军官兼作家的法国“游客”留给世人的一部西方殖民文学的经典文本。

1900年秋，绿蒂(朱利安·韦奥上校)奉命远征北京，“闯入”中国时，义和团运动刚刚惨遭八国联军的镇压，义士们挥洒在中国大地上的热血还未干涸。绿蒂的“造访”，显然是代表“武装到牙齿”的欧洲，对“衰老而黑暗的中国”②武装入侵的组成部分，在世纪之交东西文化大对抗中，他的角色：既是侵略者，又是见证者。目睹被列强洗劫的中国无处不在的死尸、废墟，面临这“衰老的古国”与欧洲强权相抗相搏后的“衰败”、“垂死”的景象，这对“痴情于东方、迷恋异国情调”③的作家绿蒂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震撼”。他以海军军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品尝、咀嚼其中的“滋味”，在滞留北京的日记里，真实地记下了昨日辉煌的东方古国，如何在当代列强的劫掠下走向“破败”、“衰亡”的历史场景。这就为读者塑造了一个

---

① 绿蒂以其《私人日记》为素材写成文章，于1901年5月9日至12月30日，连载于《费加罗》报，后结集成册为《北京的末日》，于1902年由卡勒芒-列维('Editions Calmann-Lévy)出版社出版。本书译自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Kailash Editions Paris, 1985.

②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aris, Balland, 1985. PP. 18.

③ Marc Menonville, *Avant-propos* aux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Paris, Balland, 1985. PP. 11

独特的中国形象，体现着他作为“文人”和“武夫”的双重情感：作为远征中国的海军军官，他以冷然甚至轻蔑的情感，提供了一幅灰暗的大清帝国任西方列强宰割、屠戮的真实图画——这是一个临终的帝国形象；作为迷恋异国情调的西方作家，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走向衰亡的历史图景，呈现的是衰朽崩溃的帝国文化景观，他为中国逝去的文明唱了一曲凄婉而灰色的挽歌。读绿蒂这部北京日记，重温这令人愤然、扼腕而令人自省的历史一幕，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现实警世性意义。

从我们中国读者来看，绿蒂写中国，最有价值的是，他相当真实、相当客观地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悲剧命运，身为入侵中国的法国海军军官，他有机会充当了近代中国最屈辱最黑暗时期的西方见证人，见证了腐败的清王朝倒塌崩溃的历史一幕。我们读《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会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饱经创伤的旧中国的古战场，看到了八国联军的铁蹄怎样粗暴地践踏着中国的河山；看到了苦难的中国人怎样在战乱的重压和驱策下，在入侵大兵的嬉笑中，扶老携幼，逃离自己的家园；看到了中国的万里江山经历了怎样无情的肆掠，无辜的人民遭到联军怎样无端的凌辱和屠戮：不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到处尸骨遍地，吞噬尸体的狗、乌鸦，随处可见，目不忍睹；断垣残壁、腥风血雨的北京，更像一个屠宰场，一座坟场，昔日金碧辉煌的都城和皇宫，遭到了“西方文明”怎样野蛮的洗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清庭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嘴脸，听到了入侵者胜利的狞笑，当然，也听到了“拳匪”——抵抗者愤怒的吼声；征服者在华土的废墟上，豪饮取乐、弹冠相庆，劫后幸存者在血雨腥风的角落呜咽、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泣……五光十色，构成了外国人写中国不可多得的历史景观。绿蒂以军人的冷酷和作家的敏锐，再现了近代中国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一幕。作为见证者他为中外关系史册添上了难得的一页；作为入侵者，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入侵者辩护的内心独白。

在西方读者看来，绿蒂写中国，最具情趣的，莫过于他的异国主义和东方情调。和所有异国主义文学一样，绿蒂的异国主义、异国情调产生于异国文化及异域体验的好奇和渴望——它是激发作家内在的创造力量。越是陌生越是好奇，越能激发作家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肩负军事要职的作家绿蒂，在战火纷飞、尸骨遍野的异乡异土（中国），仍难以抑制住对异乡风物的好奇和吸引，用他那支如椽的笔写下了他对陌生的中国文化的体验和渴望，使我们在他这部充满血腥气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不时地读到洋溢着异国主义、异国情调的优美文字，而这些异风异俗的展陈和描写，正是吸引西方读者的内在根由，也是绿蒂文学的价值所在。西方读者宛如置身于当年一位熟悉中国的导游带领下，他向人们解说，远在东方的古都北京，皇帝祭祀的天坛是怎样的？中国历代皇墓在哪儿？紫金城、金水桥、荷花池是什么？作为闯入中国皇宫的第一批西方人，他熟悉这儿的深宫大院、古柏、小径、亭台、廊阁，他向人们叙述他当年蛰居在这儿的所思所感所见，宫内的画梁雕栋、妃院的绣袍奇珍、厅堂的画卷长轴、闺房的珍稀陈设……向读者一一指点，为行将灭亡的大清帝国和行将消逝的古老文明唱了一曲异国主义的挽歌。也许这便是《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部异国主义文学价值所在。

绿蒂在废墟上猎取异国情调的倾向，是构筑在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的，他的审美追求，突出表现为对陌生、衰亡文明的吸引和依恋，对异国文化的物件的崇拜和好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双重身份的远征入侵者兼作家的绿蒂，在西方列强的疯狂掳掠中和血腥的罪恶中，仍能兴致盎然地展陈、欣赏大清帝国这些被洗劫的陈迹和遗物，在异域的寂寞和孤独中来玩味和品尝这些陈迹、这些遗物所内涵的东方情调，在孤身飘泊的怅惘和茫然中体验和咀嚼异国风味。他不仅在其作品中充分抒发了他的异国主义情怀，而且还在故乡罗舍福尔的沙龙里创立了一种异国主义的礼拜式。他用从北京掠夺来的文物装点晚会，渲染异国气氛，使他的文坛好友叹为观止。他在晚会上身着皇袍，头戴礼饰，端坐在龙椅上，扮演中国皇帝。龙椅是异国皇城和衰亡文明的缩影和象征，它有助于人们对充满繁文缛节、饕餮成风和纸醉金迷的皇宫生活的想象。“绿蒂聚会”(Loti-Treffen)曾被用诗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在西方异国主义文学中被反复的援用，绿蒂的作品有助于西人对遥远陌生的东方文明的想象和认识，它不仅符合当时那些足不户出的巴黎读者的胃口，而且也一直受到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读者的青睐。这就是《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一直为至今西方读者广泛阅读的原因。

绿蒂来中国、写中国是在20世纪初中欧文化大碰撞大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交织着西方列强与腐朽的大清帝国、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清王朝和义和团及清王朝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矛盾和斗争。绿蒂作为这些矛

盾的见证人，作为中西文化对峙的参与者，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不时地流露着列强优胜，始终流露着对中国人的轻视，甚至颠倒黑白，为西方入侵行径辩护，但总体上，比较客观，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古老衰弱的清帝国在国内外尖锐斗争中风雨飘摇的历史场景，这就使他的这部作品赋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他的作品也具有返观我们"自身"、认识昨天的意义。作为近代法国文学的异国情调的杰出表现者，他所描写的独特的中国景观，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东方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他在中西冲突中吁求和解，在暴力中寻求民族亲善，在仇杀中寻找友谊的"绿蒂式"的异国主义文学情调的追寻，是这位人道主义作家的理想主义表现，也是他在处理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时所表现的"亲和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的异国主义存在于"自我""他者"相互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之中，说到底，它是表现自我，反映自我的文学追求。不反映自我，也就没有异国情调，没有对"自我"进行美化的深切愿望，也就没有描写"他者"，美化"他者"的渴望。绿蒂写中国，出于对东方文明的好尚和迷恋，但对中国并不了解，他缺少谢阁兰(Victor Segalen)认识中国、描写中国的深度，也缺少和中国平等交流的态度。绿蒂在横遭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废墟上猎取异国情调，颂扬东方文明，创立亲善气氛，实际上是美化自我，炫耀西方文明，骨子里表现的是欧洲文化优人一等的思想和感情。从这个意义说，绿蒂的异国主义文学只不过是自我对他者的智性占领，这位拿枪的军人和作家，在其《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力图要作的，只不过是把东方世界和中国文明纳入他自身的审美范畴中。他在这里所描写的异国主义文化行为中凸显出的"亲和性"，也只不

过是离我们远去的“中国梦”[①]。

钱林森，2006 年 6 月 9 日，南京大学

① 参见拙著《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 209－22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原序(代)

致远东舰队总司令海军中将波蒂埃先生

中将：

我从中国寄给《费加罗报》的笔录将汇总成册并将于我回国之前在巴黎出版，而我可能来不及重审。因此，我有点担心这本书不太像样，里面会有不少重复的内容；尽管如此，我还是请求您能接受我的献词，并将其视作一名副官对您深厚而诚挚的敬意。此外，您定会对这本书持以宽容的态度，因为没有人比您更清楚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就的——那艰苦的战乱岁月，那日复一日地漂泊在海上的生活。

我仅记录下了在执行您下达的任务过程当中以及经您允许在那个至今于我尚陌生的中国所进行的旅行中的见闻。

我们抵达黄海时，交战双方已停火，北京已陷落；因此，我看到的只可能是和平占领时期的我们的士兵；在那里，我所到之处能看到的都是他们对那些谦恭的中国人非常友好。但愿我的书能有助于粉碎那些诋毁他们的可耻的无稽之谈！

中将，或许您会责备我没有记录下有关我们战舰上水兵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在我们长时间滞留在渤海湾[①]水域那段枯燥苦闷的日子里，他们虽常常疲惫不堪，却从不气馁，毫无怨言。这些可怜的水兵们一直待在铜墙铁壁之中！为了全力支持他们的统帅，他们不能像统帅们那样，有一些可以视作生活乐趣的任务和令他们兴奋的重大行动决策；他们消息闭塞，视野狭促，甚至连远处阴森昏暗的海岸也看不到。尽管中国的夏天是那么闷热，但他们那令人窒息的驾驶舱里仍要日夜点着灯；里面那湿热的空气令他们汗流浃背，偶然走出去也只是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在漆黑的夜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进行殚精竭虑的军事演习。看看他们现在那憔悴枯槁的形容就可以明白他们那默默无闻的角色是多么令人郁闷了。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总是讲述他们几近相同的困境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默默奉献的单调乏味的生活，那将不会有人费神来读了……

皮埃尔·绿蒂

① 当时叫“直隶湾”。——译者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